

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编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马识途 卷

Ma Shitu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非
外
借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马识途 卷

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马识途卷 / 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编. — 2版.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11-5309-9

I. ①中… II. ①四… III. ①马识途—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360号

ZHONGGUO DANGDAI ZUOJIA YANJIU MASHITU JUAN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马识途卷

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编

责任编辑 余 岚 奉学勤

责任校对 文 诺

封面设计 张 妮

内文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 × 239mm 开 本 16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9年4月第二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309-9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编委会

主任

邹瑾

副主任

罗勇 聂颖 牟佳

主编

夏述贵

副主编

邓经武

目 录

生平与创作

试论马识途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吴 野 003

马识途创作论 邓经武 009

踏遍青山人未老

——马识途文学创作六十年 陈朝红 018

著名革命作家马识途的生平和创作 秦 川 028

马识途小说创作风格试论 一 群 037

历经斧斤不老松

——记马识途 李 致 045

马识途：太阳照常升起 孙建军 059

锦城访马识途 张隆溪 065

再论马识途的文学生涯和人生追求 邓经武 071

瞻焉在前，仰之弥高

——《马识途文集》序 王 火 076

马识途，先生百岁不老 梁 平 080

马识途：那些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 李晓晨 087

聚焦红色文学作品

光辉动人的革命母亲形象

——读马识途同志的《老三姐》……唐正序 095

试谈《找红军》的思想意义……石化金 杨兴发 吴道勤 张晓云 099

识得春风非等闲

——读《小交通员》《路遇》随记……杨垦夫 104

谈《清江壮歌》……谭兴国 109

《清江壮歌》漫评

——兼谈小说修改本的得失……林亚光 119

《巴蜀女杰》……彭长卿 126

清江流域的英雄叙事

——读马识途的《清江壮歌》……杨尚梅 杨奕蓉 130

心路历程，青史留真

——马识途同志《党校笔记》的精神价值……章玉钧 146

对历史的理性沉淀和思想考量

——马识途先生《党校笔记》的一种解读……冯源 152

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读《没有硝烟的战线》……郭中朝 158

文学与传播媒介

——《没有硝烟的战线》的伴随文本解读……冯宪光 162

理性反思：时代最深刻的需要

——读马识途的《党校笔记》……谭继和 167

民俗化和巴蜀风的追求

谈马识途的讽刺小说……苏鸿昌 175

一株讽刺艺术的奇葩

——读马识途的《学习会纪实》 张忠富 181

小说民族化的新尝试

——读马识途长篇小说《夜谭十记》 陈朝红 184

读《夜谭十记》随笔 韦君宜 187

可喜的收获

——读《夜谭十记》 冯志伟 孙可中 190

从独特的角度关照社会人生

——读马识途的讽刺小说 陈朝红 196

论马识途作品中四川本土民俗文化的体现 张旻昉 202

试论马识途小说的民族化追求

——以《夜谭十记》为例 张旻昉 210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从《盗官记》到《让子弹飞》 陈富志 220

论《京华夜谭》的民族化特色 张旻昉 邱明丰 226

理论阐发

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识途 239

说情节

——复章林义同志的信 马识途 244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为《刺梨儿》选《马茜表姐，欢迎您！》作序 马识途 248

且说我追求的风格 马识途 252

马识途论诗

——《未悔斋诗抄·跋》 马识途 265

文学创作要追求真善美 马识途 267

与传蕪论诗 马识途 270

生平与创作

试论马识途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吴 野

马识途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他不愿意谈论他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格。他只是谦逊地表示，他正在努力追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甚至还曾质朴地把他的《夜谭十记》《三战华园》等作品称之为“新评书”、“新传奇”，说它们不过是“我摆的一个龙门阵”，“一个革命斗争故事”。

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他的作品的赞赏，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剖析一下他“继承了我国的小说传统”，“用摆龙门阵的方法”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是怎样使小说的艺术形式同作品所反映的新的生活内容融洽无间地凝铸在一起？

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继承与革新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在这组矛盾中，占据着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革新。马克思在谈到历史发展的继承性时，曾经指出：“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马识途对传统的文学形式的认识和继承，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他由天真烂漫的少年变成饱经人世沧桑、熟谙世态人情的中年的过程，是他由怀着对光明的朦胧憧憬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是他由涉猎民族传统文化而扩展到钻研世界文学名著，思想视野

日益开阔，艺术素养日益深厚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中国民族挣脱旧时代的镣铐，奔向新世纪，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的过程，是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也随之发生着巨变的过程。这些过程的交相重叠，互相生发，铸成了马识途这个人，也铸成了他的作品的艺术特色。于是，在他自谦之为“龙门阵”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鲜明的特征：

第一，白描淡写的手法，委婉有致的情节，多层次的人物配置，多线情节的相互渗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识途小说创作的独特韵味。它们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中外近代优秀小说的借鉴，是对二者的改造，重新冶炼出了既具有时代特色，又具有作家个性特色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产生这种斗争并在它的冲击下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是马识途小说创作的对象。斗争的深刻性、复杂性、剧烈性，使它同中国历史上前此的一切斗争都有了不同性质。新的人物、新的生活要求着艺术形式上的创造与发展。传统小说单一线索一贯到底的纵向发展，把一切都扭结在这单一线索的演变上，已经不再能充分适应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需要了。于是，在马识途的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它们被继承但同时也在被改造，在向前发展的轨迹。从短篇小说《找红军》《接关系》和《夜谭十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找红军》采用了视角交错的写法，从两个人的不同视角展现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通过作品中的“我”——以“军粮督办处少尉督导员”的身份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王天林当时的处境，隐约体察到透过他奇特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不甚明确的期待与追求。在这一层生活场景的下边，又隐隐透露出王天林警惕地观察着这个“少尉军粮督导员”的目光，展现了生活的另一个层次。这使得两个人物之间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带着某种紧张意味的关系。情节的发展最后引出了王天林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故事的重心由“我”身上移到了王天林身上，叙述的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人物的多层配置，视角交错，双重第一人称的运用，同富于传奇性的委婉有致的情节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地增加了这个短篇小说的容量。它使遭到了挫折的农民自发斗争，同党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结合在一起了，使

已经成为过去的斗争经历重新活在现实的斗争中了，使作品既拥有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风格，又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超出了单独叙述王天林自立红军的传奇故事所可能获得的艺术效果。

作为《夜谭十记》第一篇的《破城记》，似乎更能使我们看出马识途的“龙门阵”的艺术特色。刚读到头几页的时候，人们大概会以为这是一个类似果戈理的《巡按》那样的故事，但读完全篇之后，读者却不能不为作家善于把浓郁的传统风味同强烈的时代特色融合在一起而感到激动。在这篇作品中，两条情节线索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演出了一幕引人入胜的戏剧。没有第一条线索——县太爷迎接真假视察委员的排场和风波，难以如此神情毕肖地再现出那一大批贪婪、反动、腐朽、昏聩的“当道人物”的面目，难以入木三分地揭示产生这些人物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本质。如果没有第二条线索——游击队和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就难以使作品获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教育意义，而降低为对旧社会常见的腐败现象的泛泛谴责。整个故事的发展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跌宕起伏，委婉有致，而会走上另外一条单纯得多的道路，变成另外一种面目。摆在“明场”处理的是第一条线索，它使旧时代官场的腐败习气得到了戏剧性的渲染和揭露。第二条线索则完全被放到了舞台的后面，真到整个故事快结束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在前台演出的一切，都是在它的左右和控制之下的。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从一个穷科员的时而诚惶诚恐，时而愤愤不平，时而惊骇万分，时而痛快淋漓的口吻中叙述出来的，使交错在一起的两层情节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能动的因素。所有这些新的因素同中国小说传统的巧妙融合，使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获得了立体感与纵深感，有力地再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斗争，有助于揭示特定社会关系的本质。

第二，富于传奇性，是马识途的“龙门阵”——他的小说创作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情节的大起大落，变化的急剧与意外，巧合的运用，这些形式特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不难发现的。但事情的另一面却往往容易遭到人们的忽略，即在表现这些变生意外的事端时，作者却又在努力把传奇性淡化，或者说使传奇性现实化，使传奇性的情节发展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使人物始终活动在真实的、足以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阶级关系本质的典型环境中，从而使富于

传奇性的情节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真实。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但作家竟然把两个明显对立着的侧面拉到一起，使它们融洽无间地结合起来，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似乎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从对《找红军》《接关系》《西昌行》《三战华园》和《夜谭十记》等作品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那些大起大落、突兀陡峭的情节，虽然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是猝然而发，一来便使整个局面为之改观，人物的命运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突然发生戏剧性的转折。但是，究其实，它们却不是无因无由的。它们来得突然，但却是在现实的生活运动中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理性上认清这一道理并不困难，但要在作品所创造的形象系列中，艺术地再现这一点，却是相当不容易的。有时，由于体裁的关系，由于篇幅和叙述角度的限制，就显得更加困难了。作家凭借深厚的生活功底和熟练的艺术表现能力，出色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接关系》中，被党组织派到大巴山来接关系的共产党员任道，却被他踏破铁鞋觅不得的地下党的同志抓了起来，准备活埋。这个变故来得那么突然，进展那么奇特，一下子把任道置于死亡的边缘，但转眼又使他绝处逢生，并使他同王家盛、王二木等人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反方向的转折，使事情的面貌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这确实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但它在整个情节发展中，却又显得那么稳妥、自然，似乎不能不如此。这里边诚然有“一阵风”这个人的冒失，“心血来潮就乱整一气”的性格的因素，但作品对生活的揭示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通过这个传奇性的情节对特定的生活环境做了更深入的揭示。任道奉命来接关系的地方，是红军的老根据地。红军北上后，这里遭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一年多前，党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个主要的农民领袖都牺牲了。山霸王巴山虎又是“老奸巨猾，和我们斗了十几年，警觉性高，有相当多的经验”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任道年轻、热诚、急于事功，而又缺乏地下工作的经验，一来就上了叛徒的当，和叛徒过从甚密。这一切，落在地下党的眼里，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怀疑乃至痛恨。正如陈孟光所说，地下党的阶级警觉性和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不是抽象的认识，而是用“多少同志的血换来的”。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任道险些被自己的同志活埋的传奇性情节，就获得了充分的生活依据，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现实性的品格。类似的情形，在作家其他的作品中也

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第三，厚积薄发，耐人咀嚼，大巧成拙，形易实难，是马识途小说艺术的又一特色。这使得他的“新传奇”、“新评书”既有高度的思想性，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又具有质朴平易的形式，为人所乐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苏轼在《稼说》中，谈到治学的经验时，指出“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的原因，在于古之人“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他们“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所以，他对于治学提出的忠告便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把这番道理移到生活积累与创作的关系上，并以此来考察马识途的创作，也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识途对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所进行的有意识的观察与了解，对于党领导的国统区的地下革命斗争的亲身体验，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而他比较能有计划地进行小说创作，则已到了60年代。其间竟然有着长达三十年的酝酿、积累时期。在这三十年中，他一直企图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再现活跃于心中的人物，甚至已经写出或发表过一些篇章，但又不断被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紧张、尖锐的斗争所打断，不得不放下笔来。可见，这三十年间，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对生活和人物的形象思考，一直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为日后可能进行的创作做着体验、积累、消化、酝酿的工作。这真是持满待发，既盈必溢。但在投入具体作品的写作时，他又总是在竭力压制着想把长期积累的东西统统倾泻出来的冲动，严格地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把作品浓缩了又浓缩，对材料精选了又精选，并竭力挖掘各种人物、事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恰当地组织将置于前景和背景的东西。这些努力使他的作品不但获得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充实的情节和细节，而且获得了使人物形象自己从纸上凸现出来，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的艺术效果。这使他的作品在当代小说艺术之园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

马识途的小说有着丰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这是久已为人所知的。如果再进一步剖析这些小说，我们就会看见，它们是用许多被浓缩、精练过的材料紧密地组织在一起的，其中许多情节本身就是可以独立成篇的，稍加生发，便可以写成一部短篇或中篇小说。例如，《破城记》中仅被作为背景的游击队的活动；《盗官记》中会计师爷的调包计和张牧之做官的经历；《老三姐》中

母子两代的斗争和牺牲，等等。但作家不吝惜材料，而是把它们放在艺术构思的熔炉里，加足火力，反复熬炼，去水分，去杂质，严格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的，重新给以组织。在这样的作品里，人物的形象、特定生活情景，既获得了鲜明的具体可感的形式，又包含着经得起思索和咀嚼的深沉的内蕴。惨淡经营，而终于采取古拙质朴的形式；思虑深沉，却赋予明白晓畅的叙述，平易近人，可又总有许多不尽之言、言外之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耐人寻味。

此外，幽默与讽刺是马识途小说创作中鲜明而突出的又一特色。这不仅是指他那些享有盛誉的讽刺小说，而且是指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的一个活跃的因素，一种突出的特有的色调。但是，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再详加讨论，只好候诸异日了。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

马识途创作论

邓经武

1935年，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地方印象”专栏，马识途以对故乡风物的回忆散文《万县》参加征文活动并获奖。1938年，首次使用“马识途”的名字在《新华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武汉第一次空战》，并于同年入党，这三件事似乎已喻示着马识途今后人生的基本运行轨迹：加入共产党，可谓找到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以更名为“识途”；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时时不忘以文艺之笔表现社会斗争和时代风云；一旦正式地进入创作，就始终注意营造一种巴蜀风。这三大基点就是马识途作为一个作家的个性所在。

一

无产阶级政党因其根本目标而树立的“工农兵文学”的权威话语，共和国建立和革命胜利的骄傲，执政党要求进行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教育任务，这都使共和国文学呈现出全新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成名的作家往往因创作思维的定势和个性手法的定型而难以完全适应这种新的要求。而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马识途无须勉强地去“体验生活”和费力地“转变立场”，他那长时期地下斗争“九死一生”的经历，恰好使其个人的情感表达需要及文学价值观与时代主流话题模式达成了完全的契合。

1960年，马识途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老三姐》，这是根据自己革命斗争生涯中一个真实人物而塑造的农村普通党员形象，“老三姐”那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机智，对同志的热情关怀以及那朴实无华的为人，都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段时期，马识途又连续推出《接关系》《小交通员》几个革命历史题材短篇，而《找红军》则是其代表作。

《找红军》通过革命者“我”被派往一个新地方从事革命工作的一段经历，在广泛揭示阶级压迫下民不聊生现状的同时，通过作品主人公、青年农民王天林的性格表现，反映了中国农民不堪剥削压迫，希望自发的反抗斗争改变自己命运，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斗争经验不够而陷入失败时，小说通过对王天林隐匿多年而一直执着地寻找红军的顽强意志的描写，揭示了中国农民渴望革命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热切愿望，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最终获得胜利的社会基础。

小说将人物性格置于发展变化中去展示，正是作者创作初始就体现出的可贵之处。作品主人公王天林因不堪压迫而萌发反抗意识，“川北红军”传说使他看到了希望，在“找红军”的过程中因为幼稚而历经艰险，而自立红军的方式也只是“在腰上缠条红带子，枪上吊着红坠子，还把头上缠的白帕子染红了，硬是一身都红起来了”。但主人公稍获胜利就忘乎所以，让敌人奸细混进来，导致了“全军覆没”。失败的教训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他学会了隐蔽自己、暗中观察，以巧妙的方式进行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注意的是，这篇小说选取巴蜀大盆地社会作为背景，以当时的“川北红军”和地下党的活动为情节框架，注意营造一种巴蜀语风，大量使用蜀地方言语汇如“玩格”（享受、摆架子）、“帮长年”（干长工）、“呻唤”（呼痛）、“摆龙门阵”等，使小说具有较浓的巴蜀地域色彩。

在马识途的初期创作中，注重写普通人，即使是革命者也非完美无缺，从而使他的小说有极浓的生活真实性。如《找红军》中的王天林，在日常生活中就有着“脾气不对头，一天难免要顶几杠子”的性格缺点，但这正是他历经失败又找不到红军的内心焦急所致，刚听到关于红军传说时对“一片红色，红头